

# 不要講幹話！初探台灣社群媒介中的「謗王」現象

## 摘要

無論古典文獻或現代理論都指出，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人民出於義憤而對統治者惡言相向，未必就是缺乏溝通理性。為瞭解台灣「謗王」的實際情況，本研究透過文本探勘與論述分析，檢視行政院長賴清德發表「照護員功德說」的前後一星期，即 2017 年 11 月 18 日至 30 日之間，賴清德院長與蔡英文總統的臉書粉絲專頁資料。

關鍵詞：惡言相向，髒話，義憤，溝通理性，文字探勘，講幹話

## 一、研究目的

西元前 841 年，西周王國（約前 11 世紀-前 771 年）首都鎬京發生市民（國人）起義，國王遭到流放，再也沒能回國，死後還得到「厲」，亦即「暴虐無親」的惡諡。《國語》這麼記載這場變亂的經過：

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國語》〈周語上〉）。

這份政治溝通，或更精確地說，政治「不」溝通的記錄，或許是描述言論控制系統（衛巫監謗），與地下溝通管道（道路以目）之間糾葛的第一個故事。不幸的是，直到近三千年後的今天，我們仍能聽到這則故事的反響：稜鏡計劃（PRISM）與維基解密（WikiLeaks）、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與虛擬私人網絡（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sup>1</sup>。

我們或許能從這則故事中得到一點教訓。首先，在某種情況下，人民對統治者的誹謗、詆毀、咒罵、或者用學術語言來說，惡言相向（verbal aggression），是政治溝通過程的一環；其次，若統治者拒絕溝通，或者忽略，甚至系統地壓制這些惡言，往往讓這些惡言轉往地下發展，甚至可能於引發反統治者的行動，輕則支持政黨輪替，重則造反起義。

本研究主旨，即在了解當前台灣政治溝通脈絡中，人民對統治者惡言相向，或可稱作「謗王」的現象。有鑑於社群媒介，尤其是臉書，已經成為台灣重要政

---

<sup>1</sup> 稜鏡計劃（PRISM）是美國政府自 2007 年開始秘密實施的網路監控計畫，許可的監控對象包括任何在美國以外地區，使用參與計畫公司服務的用戶，或是任何語國外人士通信的美國公民。維基解密（WikiLeaks）是 2006 年成立的國際性非營利組織，專門協助匿名消息來源披露組織、企業、政府秘密文件。2013 年，維基解密協助曝光了稜鏡計劃的 E. J. Snowden 逃亡。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又稱中國國家防火牆，是中國政府網路審查系統的總稱。虛擬私人網絡（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是透過公用網路（如網際網路）傳輸內部網路訊息的技術，該技術常被用來繞過防火長城的審查機制。

治溝通管道，而包括「謗王」在內的各種網路中介溝通活動，也可透過文字探勘 (text mining) 方法採取，本研究對「謗王現象」的觀察，將聚焦於社群媒介中介的相關事件。又由於截稿時間限制，僅針對行政院長賴清德與總統蔡英文的臉書粉絲頁，在 2017 年 11 月 18 日至 30 日之間，即賴揆發表「照服員功德說」前後一星期的資料，進行文字探勘與論述分析。

以下本研究將分為二個主要部分，其中二到四段探討「謗王」現象的理論意涵，五到八段對經驗資料進行分析與詮釋，並在最後一段做出結論。

## 二、惡言相向與溝通理性

要了解「謗王」現象之前，得先定義何謂惡言相向。惡言相向是對他人出口惡言詈辭 (aggressive language) 的行動 (Hamilton, 2012: 6)，包括攻擊特徵、攻擊能力、侮辱 (insult)、詛咒 (maledictions)、逗弄 (teasing)、嘲笑 (ridicule)、髒話 (profanity)、威脅與其他非口語 (nonverbal) 指標等 (Infante, 1987)。

對他人惡言相向，有助於消解緊張、控制負面情緒 (Martin, et al, 2010)、更快自衝突中恢復過來 (Lai & Linden, 1992)，但也可能引發自身恐懼、悲傷、罪惡感等負面情緒 (Aloia & Solomon, 2016)；遭他人惡言相向，則會讓人產生憤怒、焦慮、悲痛、沮喪等各種負面情緒 (Block, Block, & Morrison, 1981; Cummings, Davies, & Simpson, 1994; Kinney, 1994; Porter & O'Leary, 1981; Whitehead, 1979)，所受到的長期心理傷害，甚至比遭受暴力攻擊 (physical aggression) 還嚴重 (Infante & Wigley, 1986)；更危險的是，遭他人惡言相向所引發的憤怒情緒，還可能導致進一步的衝突升級 (Infante & Rancer, 1996)，因此一般而言，惡言相向被認為是一種反文明、反社會的行為，有可能摧毀小團體與組織中，意圖增進理解的公民論述 (civil discourse)、讓極端主義更加惡化、引發衝突、癱瘓組織，甚至暴力與流血事件乃至全面戰爭 (Hamilton, 2012)。

既然如此有害，人們為何惡言相向？過去研究指出，可能引發人們口出惡言的因子，包括腦損傷 (Rao et al., 2009; James, Bo'hnke, Young, & Lewis, 2015)、使用藥物 (Haward, 1958; Hyder, et al. 2017)、觀看暴力影片 (Sebastian, Parke, Berkowitz, & West, 1978)，以及在溝通過程中遭遇各種令人煩躁的事件 (Charles & Mech, 1955; Day & Hamblin, 1964; Infante & Wigley, 1986)。

先排除與本文主題無涉的前三類因子。在溝通過程中，可能遭遇哪些令人煩躁而可能引發惡言相向的事件？

根據 Infante 與 Rancer 所研發，又有許多研究採用的「惡言相向個性量表」( the verbal aggressiveness scale )，其中設計了可能讓人口出惡言的七種溝通脈絡，包括：(1) 當我駁斥或難以駁斥他人觀點；(2) 當我試圖改變或難以改變他人；(3) 當他人做我認為的蠢事，或不在意我知道的要事；(4) 當他人做事下流、卑鄙又殘酷；(5) 當我非常討厭某人；(6) 當他人辱罵我；(7) 當論辯轉向人身攻擊，我也加入等 ( Infante & Wigley, 1986 )。

根據可能引發惡言相向反應的不同刺激來源，這些溝通脈絡可以分為三類：一、對言 ( 當他人辱罵我、當論辯轉向人身攻擊，我也加入 )；二、對人 ( 當我非常討厭某人、試圖影響或難以影響他人 )；三、對事 ( 當我駁斥或難以駁斥他人觀點、當他人做我認為的蠢事，或不在意我知道的要事、當他人做事卑鄙、下流又殘酷 )。

在「對言」與「對人」脈絡中，惡言相向或是對他人惡言相向的防衛行動，或是直接攻擊他人，都是無助甚至破壞溝通的行為；但在「對事」的脈絡中——當我駁斥或難以駁斥他人觀點、當他人做我認為的蠢事，或不在意我知道的要事、當他人做事卑鄙、下流又殘酷——惡言相向則並非意圖破壞溝通。雖然這一方面可能導致破壞溝通的非意圖結果，然而另一方面，若對方能夠體諒惡言者「對事不對人」的意圖，也未必不可能讓溝通導向正面結果<sup>2</sup>。

因此，即使惡言相向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的溝通衝突，但兩者之間絕非決定論式的因果關係，正如 Locher 與 Watts 的「打關係」( relational work )理論所指出，說話有無禮貌的判斷標準，不能透過分析事先預判，而是參與溝通者之間透過實際論述周旋 ( discursive struggle ) 所協商出來的 ( Locher & Watts, 2005 )。進一步言之，在「對事不對人」的溝通脈絡中，惡言相向還可能引發共識產生。我們可以把這個陳述，放到溝通行動理論 (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 下的溝通理性 (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 概念中加以檢視，根據 Habermas：

溝通理性的概念，奠基在人們於論辯過程中經驗到的，非強迫整合與推進共識的力量上；在這樣的論辯中，個別參與者能夠克服其自身主觀意

---

<sup>2</sup> Tremblay ( 2000 ) 回顧百年來的攻擊性 ( aggression ) 研究指出，若人類的攻擊性是由社會來界定，則檢視引發攻擊性的意圖 ( 為了造成傷害 )，就尤其具有方法論的重要性。然而「有趣的是，雖然過去二十年來兒童攻擊行為的主要研究，都是啟發自社會習得 ( social learning ) 取徑，但大多數這些研究的歸因，並不根據對傷害意圖的評估」( Tremblay, 2000: 131 )。

見，並且根據對於彼此理性意圖的信念，確保所有人都能整合自身客觀世界，以及生活世界的主觀間性(intersubjectivity)(Habermas, 1981: 10)。

基於上述理論，也可以得到相同結論：只要參與溝通者願意相信，彼此意圖旨在非強迫地整合與推進共識，即使惡言相向，也是符合溝通理性的行為。放到政治溝通的脈絡來看，同樣，人民對統治者惡言相向，也可能是理性的溝通行動。

### 三、惡言詈詞與義憤填膺

既然不能單靠惡言的形式或符號(sign)，還必須考量到口出惡言與遭受惡言者雙方的意圖或目標(object)，才能判斷惡言相向是否符合溝通理性，那麼本文接著將要討論，在政治溝通脈絡中，尤其在參與論辯者之間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人民「謗王」的意圖何在。

以後漢帝國(25-220年)末期的「黨錮之禍」為例。當時連續兩任皇帝放任宦官集團作威作福，許多士人甚至平民上書批評，卻遭到逮捕下獄甚至處死，並牽連親族終生不得任官。關於這場政治溝通危機，《後漢書》這麼記述：

宦官……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後漢書》〈宦者列傳〉)。

這段記述指出，在宦官集團「敗國蠹政之事」的刺激下，人民當時有五種反應：唉聲嘆氣(嗟)、避難隱居(窮棲)、四處造反(搖亂區夏)、懷憤批評(奮發言出)。避難與造反，是不相信統治者還有溝通理性的反應，也是政治溝通常規系統崩潰的結果，本文不加討論；而還願意留在政治溝通常規系統的人民，首先感嘆統治者違反國家共同利益的不義<sup>3</sup>行為，接著心懷憤怒，而在義憤填膺下，少數忠良之士甚至甘冒下獄與被殺的風險批評統治者，正如孔子所言「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孝經》)。

---

<sup>3</sup>「義」原指祭祀占卜所顯示的吉兆，後引申為符合社群(community)整體利益的行為判準，例如「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左傳》〈昭公十年〉)，「私讎不及公，好不釋道，惡不去善，義之經也」(《左傳》〈襄公五年〉)。從溝通行動理論來看，作為社群整體利益判準的「義」，是互為主觀性的，屬於溝通理性的範疇；雖然孟子的性善學說，試圖把原本歸因於遵循外在社群判準的「義」，轉而歸因於人們內在德性的「義」。關於「義」的概念演化，可參考吳忠偉(2017)。

就一般觀點而言，憤怒是與暴力行為相連的情緒。Ekman 指出「憤怒是最危險的情緒，因為……我們可能會試圖傷害使我們憤怒的對象，或許只是憤怒的言詞……但要傷害對方的意圖是同樣的」( Ekman, 2003: 114 )。但古典文獻指出，憤怒也可能是理性控制，甚至策略考量下的情緒表達，所謂「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禮記》〈樂記〉)、「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上〉)。這樣的觀點也得到現代情緒研究的支持，同樣是 Ekman 指出「憤怒會驅使我們阻止或改變，任何讓我們發怒的事物；向動機不義的行為發怒，會帶來改革行動」( Ekman, 2003: 123-124 )。

在與統治者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義憤，亦即對不義行為的憤怒，是驅使人民敢於反對統治者的核心動機。而這完全符合 Casstells 關於 2010 年「阿拉伯之春」( Arab Spring ) 的研究所指出的，憤怒往往能克服人民對不義行為的焦慮，讓他們更知覺到不義行為、更認定誰該對這些不義行為負責，並且可能激發人民冒險，無論是批評時政甚至起義造反 ( Casstells, 2012: 12 )。

當然，批評不等於攻擊，但在義憤填膺的情況下表達出來的批評，往往與攻擊之間界線模糊，正如本文前引 Infante 與 Rancer ( 1986 ) 指出，當人們認為他人做事卑鄙、下流又殘酷時，容易以惡言犯之——甚至在面對皇帝的時候。

在黨錮之禍初期，一位民間算命師 ( 方士 ) 自外郡進京上書，主張皇帝重用無後的閹人為地方官，不合星象所傳達的天意，才會一直生不出兒子：

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系嗣未兆，豈不為此？  
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後漢書》〈郎顛襄楷列傳下〉

Bolton 定義了在溝通過程中，容易傷害對方自尊，引發抵抗與怨恨的十二種障礙 ( Bolton, 1986: 135-136 )。這位算命師的一小段話，就包含其中五種：批評 ( 負面評價對方的行為或態度 )、威脅 ( 透過警告對方下場淒慘，以試圖控制對方 )、道德勸說 ( 告訴對方該怎麼作 )、建議 ( 提供對方不合其意的解決方案 )、邏輯論辯 ( 試圖透過事實或邏輯使對方信服 )。幸好中國自先秦以來就有臣下對君主「犯顏直諫」的政治溝通傳統<sup>4</sup>，而當時是「黨錮之禍」初期，政治溝通常規系統還算正常運作，皇帝以為這位膽敢警告皇帝斷子絕孫的算命師「言雖激切，

---

<sup>4</sup> 戰國 ( 前 5 世紀-前 221 年 )「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怨思》)；漢朝 ( 前 202-220 年 )「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遏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前漢記》〈孝昭皇帝紀〉)。

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後漢書》〈郎顛襄楷列傳下〉)，只把他關了一陣子就放回家去了。

綜上所述可以歸結為以下四點：

其一、根據溝通行動理論，只要溝通參與者之間，信任彼此意圖旨在非強迫達成共識，則惡言相向並不違背溝通理性。

其二、憤怒固然會激發人們試圖傷害使其憤怒的對象，而無論根據古典文獻或當代情緒心理學，憤怒也促使人們勇於變革使其憤怒之事。

其三、無論古今歷史研究都指出，義憤是使人民勇於批評統治者的核心動機。

其四、批評與惡言相向之間的界線往往模糊。

有鑑於第四點不過就是「刀子口，豆腐心」之類的俗民常談，以下將藉由 Jay (1999) 所提出，咒罵的神經-心理-社會理論 (the neuro-psycho-social theory of cursing) 的觀點，解釋「心懷善意卻口出惡言」這個看似矛盾的溝通現象。

#### 四、神經-心理-社會理論對惡言相向現象的解釋

Jay (1999; 200n) 主張，口出惡言是神經、心理與社會-文化等不同等級溝通脈絡<sup>5</sup>的共同作用，包括「神經控制」、「心理動機與克制」以及「社會-文化規約」，所引發的現象。

首先說明生理等級。既然腦部損傷與使用藥物，會讓人們容易口出惡言 ( Rao et al., 2009; James., Bo“hnke., Young., & Lewis, 2015; Haward, 1958; Hyder, et al.

---

<sup>5</sup> Jay 的神經-心理-社會理論，可以透過 Wilden 提出的「自然與文化間的依賴階層體系」(dependent hierarchy between nature and culture) 加以理解。Wilden 主張，不同複雜度 (complexity) 等級的溝通脈絡，構成了一個依賴階層體系。所謂「依賴」是指，每個等級較低的溝通脈絡，都依賴於 (也因此受限於) 更高等級 (即其環境) 的質量、能量與資訊，以維持其自身存有與再生產/生殖 (reproduction)。文化依賴社會而存有，社會依賴有機自然而存有，有機自然依賴無機自然而存有；另一方面，等級較高的脈絡，則可控制較低的脈絡，文化可以控制社會 (例如，選擇米或麥)，社會可以控制有機自然 (例如，選擇耕作或畜牧)，有機自然可以控制無機自然 (例如，選擇農業或狩獵-採集) (Wilden, 1987/2001)。

2017)。這就暗示了人們克制惡言出口——怒吼、污辱 (insult)、咒罵 (swearing)、威脅等，暴力而非嘲弄式惡言<sup>6</sup>——的能力，有其生理基礎。

當代認知神經學指出，大腦的左右半球掌控不同心智功能，左腦掌控大部分的語言與言說 (speech) 功能，右腦則掌控非口語的情緒言說、視覺化與空間推理、以及整體化 (holistic process) 等功能 (Gazzaniga, Ivry & Mangun, 2008)。Jay (1999) 引述 Jackson (1958)，區分主動、創造的「命題式」(propositional) 言說，與自發、反射、非創造的「非命題式」(nonpropositional) 言說，如咒罵、成語及俗話。大腦損傷可能會使病人喪失「命題式言說」，亦即系統地建構語句的能力，但仍保留咒罵的能力，於是病人會非提議或反射地口出惡言。其後研究發現，大腦左額葉 (left frontal lobe) 損傷的病人，會喪失控制衝動行為的能力，很容易被引發憤怒、攻擊、咒罵、焦慮與拒絕等情緒式的怒罵反應，而多數右腦損傷的病人卻完全不會咒罵 (Gainotti, 1972)。

進一步研究則指出，非命題式言說需要主司情緒的右腦-邊緣系統 (right hemisphere-limbic) 參與，這一點可由左腦損傷者的惡言失控症狀推論出來 (Van Lancker, 1987; Code, 1987)；另一方面，右腦損傷的病人固然不會咒罵，但這是由於腦傷讓他們難以知覺他人的情緒，也難以表達自己的情緒 (Ley & Bryden, 1979; Winner & Gardner, 1977)。

基於種種神經證據，Shapiro、Shapiro、Young 與 Feinberg (1988) 假設，右腦或許有個區域——Jay (1999) 稱作「咒罵模組」(cursing module)——專門處理不宜或下流的聲音、詞彙、語句、概念或動作。總而言之，口出惡言現象奠基在生理等級的人類神經結構之上。

其次說明心理等級。前段說明口出惡言現象，奠基在神經結構上，而即使並非腦傷病人，人們在面臨負面情緒波動，尤其是憤怒與挫折時，也往往口出惡言。

心理語言學的主流觀點，例如 Pinker 主張，這類惡言詈詞是與啜泣、大笑、呻吟、驚叫等非口語聲調同類，由大腦下皮質 (subcortex) 主司情緒的神經結構，

---

<sup>6</sup> 在神經精神病學領域，腦傷與口出惡言之間關係研究 (如 Alderman, Knight, & Morgan, 1997; Yudofsky, Silver, Jackson, Endicott & Williams, 1986) 常採用的「有害攻擊行為量表」(overt aggression scale) 或修訂版有害攻擊行為量表 (modified overt aggression scale)，關於惡言相向的測量項目只包括暴力式的怒吼、污辱、咒罵、威脅；與心理學領域 (如 Infante, 1987) 還將嘲弄式的逗弄 (teasing) 與嘲笑 (ridicule) 也算作口出惡言，在分類上不全然相同。

即邊緣系統( limbic system )所控制的神經反射式情緒表達，而非由皮質( cortex )所控制，具有句法 ( syntax ) 與語意 ( semantics ) 的完整語言 ( Pinker, 1994 )。

然而 Harris 等指出，使用母語者的神經反射式咒罵，比使用第二語言者常見得多 ( Harris et al. : 2003 )，如果咒罵與大笑、驚叫是同一回事，不該會有這種差別。Jay ( 1999; 2007; 2008 ) 指出，與天生的大笑、驚叫不同，口出惡言 ( 或口無惡言 ) 是後天的、個人自父母與同儕那裡習得的。兒童顯然需要花費數年時間，才能把右腦控制的憤怒情緒，與左腦控制的惡言詞彙聯繫起來，而且一旦習得，具有內含意 ( connotation ) 的惡言，往往會取代無意的怒吼與驚叫。顯然，象徵的 ( symbolic ) 惡言 ( 幹！ ) 比肖似的 ( iconic ) ( Jay 與 Janschewitz [2007]稱作物理的[physical] ) 怒吼與驚叫 ( 啊！ )，能夠表達更強烈的情緒，情緒越強烈，就可以選用更髒、更惡的字眼，從一、三到五字經，由此可見咒罵式惡言具有語意<sup>7</sup>。因此，口出惡言亦奠基在心理等級的個人學習歷程之上。

其三說明社會-文化等級。進一步說，惡言詈語不只可能具有內含意，還可能具有外延意 ( denotation )，能夠對他人表達語言化的情緒，亦即惡言相向<sup>8</sup>。

Montagu ( 1967 ) 將惡言相向區分為兩類，「敵意式」( hostile ) 與「工具式」( instrumental ) 惡言相向，前者旨在反擊傷害了口出惡言者自尊的某人，後者則旨在透過口出惡言，獲得他人的回饋；有鑑於無論敵意或工具式惡言相向，都不是反射動作，而是目標驅動 ( goal-driven ) 的行動，因此 Bandura ( 1973 ) 主張兩者都是工具式，Zillman ( 1979 ) 則將兩者改稱作「惱怒-動機式」( annoyance-motivated ) 與「誘因-動機式」( incentive motivated ) 惡言相向。

---

<sup>7</sup> Jay ( 1999 ) 引述 Zwicky 等 ( 1971 ) 指出，英語惡言 ( 如“fuck you” ) 如何有句法。像是它不是祈使句，因為“please fuck you”不成句，而它也無法與其他祈使句組合在一起，例如“wash the dishes and fuck you”不成句。至於漢語，則目前未見髒話文法相關研究。

<sup>8</sup> 針對美國兒童、護理之家與心理衛生設施中成人的咒罵研究指出，除了用來表達驚訝、用來說笑、嘲笑以及陳述或評估正在發生的事件之外，大約三分之二的髒話是在表達憤怒 ( Jay, 1992; 1996a; 1996b )，而雖然沒有相關統計數字，但這與當前台灣的語用脈絡類似。何韻詩 ( 2011 ) 將台灣大學生使用髒話的脈絡分為七項：(1) 個人權益被踰矩；(2) 個人極限被挑戰；(3) 壓力讓人無法負荷的狀況；(4) 環境造就的髒話使用；(5) 特定族群的髒話使用；(6) 男性氛圍作祟下的髒話使用；(7) 事情的發展不如預期等。前三項大約等於「表達憤怒」，中間三項大約等於「說笑」與「嘲笑」，最後一項大約等於「驚訝」與「陳述或評估正在發生的事件」。

因此，不同於只有內含意的口出惡言，具有外延意的惡言相向，是評估風險後作出的策略判斷，因為惡言者無法事先確定，對方遭到惡言相向後會有什麼反應，亦即，評估惡言相向的能力，有賴人們是否能夠掌握，在社會-文化等級的各種溝通脈絡（如政治、宗教、民俗忌諱、性別、法律等）中，口出惡言會引發何種效果的語用（pragmatics）知識。

有鑑於神經結構大抵人人相同、情緒表達卻是人人相異，Jay（1992; 1999）提出一個神經-心理-社會理論的五階段模式，用來描述憤怒所引發的惡言相向如何發展。首先是「激怒」（provocation），即人們遭遇到各種激人發怒的因素，如個人失誤、財物損失、察覺對自己的污辱等；其次是「憤怒程度」（degree of anger），在被刺激後，基於各種生理與心理機制，人們會經驗到憤怒情緒，咒罵反射動作會在此階段之後立即發生；其三是抑制（inhibition），由於應對風格（coping style）、道德發展、習慣等因素的個人差異，人們可能會抑制自己口出惡言的衝動；其四是「去抑制」（disinhibition），衡量有哪些激怒因素出現、這些因素為何出現、以及誰造成這些因素後，人們也可能不再抑制自己，採取惡言相向行動，而這些行動必須處理引發它的脈絡，例如「賤」，對人而言是惡言詈詞，對物而言則不是——雖說現在已經少人用「賤」來指涉某物價錢便宜；最後是「懲罰」（retribution），即人們口出惡言後，所得到的結果。Jay 總結道：

憤怒是一種神經反應，而該如何表達憤怒，則是在特定家庭與文化脈絡中習得的。惡言相向是表達憤怒的一種方式。敵意與工具式惡言相向，是利用自社會脈絡中習得的策略，進行決策所產生的結果。對於說者與聽者而言，惡言相向的意義，取決於溝通脈絡中，促成惡言出口的事件，以及惡言出口的結果。因此不該假設，惡言相向只是一種負面情緒，因為它所導致的結果，無論正面或負面都有可能（Jay, 1999: 59）。

Jay 的神經-心理-社會理論，可以合理解釋「心懷善意卻惡言相向」的表面矛盾，同時也支持本文前段根據 Habermas 溝通行動理論所推論出的命題：只要參與溝通者願意相信，彼此意圖旨在非強迫地整合與推進共識，即使惡言相向，也是符合溝通理性的行動。因此就理論而言，在政治溝通過程中，人民確實可能「善意地對統治者惡言相向」，尤其從社會-文化等級的溝通脈絡來看，中國士人階級自先秦來一直都有犯顏直諫的傳統，所謂「忠不避危，愛無惡言」（《晏子春秋〈外篇上〉》）。

## 五、探尋「謗王」事件的指標

前述理論探討肯定了三個命題：一、惡言相向是生理、心理與社會-文化等三個等級的溝通脈絡，共同作用的結果。二、惡言相向既可能破壞溝通，亦可能促進溝通，視溝通脈絡而定。三，人民對統治者惡言相向，亦即「謗王」，是義憤的表現；在政治溝通脈絡中，「謗王」可能是人民追求與統治者達成新共識的行動；在政治「不」溝通的脈絡中，則可能引發人民支持政黨輪替甚至造反起義。以下本研究將基於此三命題，嘗試了解當前台灣的「謗王」現象。

台灣有幸，不必透過地下管道才能「謗王」。但要了解在地謗王現象，仍有兩個方法論難題：首先，與較正式的言論空間（如報紙投書）相較，謗王現象更可能發生在較不正式的論述空間（如街談巷議）中；其次，惡言相向通常是突發現象，難以即時記錄。因此就在不久以前，若要進行謗王研究，還只能依賴抽樣與研究對象的事後報告。幸運的是，這些難題目前已經部分解決，因為傳播環境的以下發展：其一，串連了較正式（如網路論壇）與較不正式（如私訊）論述空間的社群媒介，已經成為在地重要政治溝通管道（李怡志，2016）；其二，社群媒介所中介的各種溝通活動，包括「謗王」，可以透過「文字探勘」法加以捕捉。

然而由於以下原因，社群媒介中介的謗王活動，並未映射（mapping）整體謗王現象。首先，社群媒介固然留下了過去只能透過抽樣推估的鉅量數據，但其中排除了非社群媒介用戶，在技術上也難以根除人頭帳戶<sup>9</sup>留下的大量數據。其次，社群媒介基於文字（text-based）而非語言，因此其中的言說行動，當然包括「口出」惡言，都是透過「文字轉譯」與「社群媒介中介」的溝通行動，而根據 McLuhan（1994），不同介質（medium）所中介的溝通行動也會不同。例如，不同於面對面的謗王行動，臉書中介的謗王，是在參與者之間「無法透過表情，精確掌握彼此情緒即時變化」的情況下進行的。根據 Hatfield、Cacioppo 與 Rapson（1994），在面對面溝通者之間，會發生彼此之間，面部表情、動作、聲音、姿勢，不自覺地逐漸同步的「情緒感染」（emotion contagion）現；有鑑於情緒在「謗王」行動中的核心地位，面對面與臉書中介的謗王，或許有所不同，雖然有研究

---

<sup>9</sup> 例如，根據可分析臉書粉絲頁按讚國家來源的網站“Facebook Like Checker”（網址：<http://www.fblikecheck.com/>），在 2017 年 9 月的統計，前總統府副秘書長羅智強的臉書粉絲頁，所獲得的 91 萬讚（like）中，來自台灣的僅佔 53%，其餘則多來自印尼、尼泊爾、孟加拉、馬來西亞、印度等國。

( Guillory, Spiegel, Drislane, Weiss, Donner & Hancock, 2011; Hancock, Gee, Ciaccio & Lin, 2008 ) 支持，負面情緒也會透過線上溝通感染。

雖然如此，在近年來政府越趨重視網路民意 ( 陳敦源、蕭乃沂、廖洲棚、陳心怡、國家發展委員會、電子治理研究中心，2007 ) 的情況下，社群媒介中介的謗王活動，仍不失為整體謗王現象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研究對於在地謗王現象的經驗觀察，將聚焦於社群媒介中介的謗王事件。然而如何在社群媒介用戶所留下的鉅量數位足跡中，找到「謗王事件」？根據神經-心理-社會文化理論的推論，這些事件應該具有三個溝通脈絡等級的指標：

其一、生理等級指標：參與溝通者的憤怒情緒。憤怒當然未必是義憤，但義憤總是一種憤怒。

其二、心理等級指標：惡言詈語，尤其是最顯著反應憤怒的各種髒話 ( swear word、taboo word 或 profanity )。雖然缺乏在地的相關經驗研究，但根據 Jay( 1992; 1996a; 1996b ) 以及 Jay 與 Janschewitz ( 2007 ) 在美國的經驗研究指出，無論兒童或成人說出來的髒話中，大約三分之二是在表達憤怒。

其三、社會-文化等級指標：在本地的政治溝通脈絡中，較易引發人民義憤的類型事件。在台灣，「政府無能保障人民再生產 / 生殖 ( reproduction )」的類型事件，往往激起台灣人民義憤。例如 1997 年的「白曉燕事件」與 2013 年的「洪仲丘事件」，都引發十萬人民街頭抗議。在過去的政治溝通環境中，人民街頭抗議是透過民間社團的號召，例如白案 ( 陳希林，1997 年 5 月 3 日 )；如今人民的義憤，更容易透過網路串連起來 ( Casstells, 2012 )，街頭抗議則是透過網路號召，例如洪案 ( 陳蕾，2014 年 11 月 )。

在以上三個等級的指標中，作為一種情緒的憤怒，一旦脫離面對面溝通脈絡就難以判定，而作為最佳情緒指標的臉部表情，又難以大規模搜集與分析 ( Ekman, 2003 )，或許不久後，這個難處即可透過大規模監視系統加上面部辨識技術加以克服，但總還會有侵犯人權的疑慮；因此本研究退而求其次，只使用心理與社會-文化等級的指標，前者指涉憤怒，後者則指涉義憤。巧合的是，在 2017 年下半年，出現了一個橫跨心理與社會-文化兩個等級，適合在社群媒介用戶所留下的鉅量數位足跡中，定位在地謗王事件的指標：「講幹話」。

「講幹話」一詞，源自福佬話「識古」的粗俗訛變「姦<sup>10</sup>古」，指涉人們說些出人意表的誇張話以取笑的一種口語藝術 ( verbal art ) ( 參見 Bauman, 1974 )，亦即「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論語》〈衛靈公〉)的粗俗說法——或者更精確地說，「言不及義」是對於這種口頭藝術的文雅說法。與「講幹話」同樣意思的詞彙還有「打嘴砲」、「吹牛屎」、「畫虎卵」、「閒扯蛋」、「攞豬屎」、「打屁」、「練癢話」等；這些詞彙的共通特徵在於都包含了髒話 ( 性交、口交、生殖器、排泄物與精神異常 )，表示這類口語藝術的無禁忌、不正經、言不及義。

與同類其他詞彙相較，「姦古」在本地日常言說中並不普及，其國語化的「講幹話」更加少人使用；2017年，「講幹話」一詞突然在台灣大為流行<sup>11</sup>，而這個流行趨勢，與這段期間的社會脈絡，尤其是政治溝通脈絡有關。

當年年初，「講幹話」的創新語用脈絡，在批踢踢中突現 ( emerging )。被老百姓用來指責打官腔的當權者，就和在嚴肅場合說輕薄笑話一樣，令人憤怒——這就和和指責他人「說屁話」、「練癢話」的意思差不多，只是過去幾乎沒人這麼用。到了2017年下半年，「講幹話」的新用法，開始氾濫到主流媒體那裡。5月22日，民進黨立委蔡易餘在電視新聞中表示，其父親前立委蔡啟芳要求他「在本會期排審【赦免法】，否則斷絕父子關係」是在「講幹話」，並戲稱其父為「幹話王」(自由時報，2017年5月23日A)。蔡易餘說話當下的語用脈絡，是說其父在開玩笑，亦即「講幹話」原本的意思(自由時報，2017年5月23日B)。然而這則新聞播出後，不知道原本用法的大多數人們，卻不約而同地採用先前在批踢踢上醞釀出來的新用法。例如2017年底，政治評論臉書粉絲專頁《小聖蚊的治國日記》舉辦「2017天下第一幹話王大賽」，列出各界掌權人士(三分之二是政治家與資本家)與他們講過的幹話，開放臉書網友透過按讚票選，在活動期間的五天內共得到重複計數的85,673個回應。

---

<sup>10</sup> 「姦」是「幹」的本字。「幹」原本並無性交的意思，把「姦」寫成「幹」是將其文雅化，當然並不徹底。

<sup>11</sup> 根據本研究在2018年2月20日，以關鍵詞「講幹話」查詢「Google趨勢」顯示，過去五年來，台灣地區透過Google搜尋「講幹話」一詞的次數比例，自2017年3月12日起開始穩定出現20以上次數比例，在2017年5月14-20日間達到五年來最高比例(100)，其次是該年7月2-8日間的次高比例(80)與12月24-30日間的第三高比例(79)。

歷史巧合讓「幹話」一詞，在 2017 下半年的台灣，成為橫跨心理與社會-文化等級溝通脈絡的「謗王」指標。在心理等級，它包含了國罵等級的惡言詈詞——「幹」<sup>12</sup>；在社會-文化等級，則是創新語用的流行語，用來指責打官腔的當權者，因此它有助於在鉅量的社群媒介資料中，定位出這段期間的謗王事件。以下本研究將以「講幹話」一詞作為指標，針對行政院長賴清德與總統蔡英文的臉書粉絲專頁，進行文字探勘與論述分析。

## 六、資料選擇

由於論文截稿時間限制，本研究只針對賴揆的臉書粉絲專頁，在 2017 年 11 月 18 日至 30 日之間的資料，並與取自蔡總統粉絲專頁，同時間的資料相互比對，加以研究。挑選此範圍的理由如下：

其一，無論總統或行政院長，都是人民政策問責——謗王的最高對象。

其二，政治人物的粉絲專頁，框架 ( flaming ) 了其所中介的主要溝通行動，是政治溝通行動，而只有在政治溝通脈絡中的謗王，才可能具有溝通理性。又，截自 2017 年 10 月，《賴清德》與《蔡英文 Tsai Ing-wen》臉書粉絲專頁，分別獲得 55 與 92 萬不重複互動人數，是全國政治人物粉絲頁的第五與二名 ( 莊維孝，2017 年 12 月 8 日 )，再加上板主不大可能冒「限制言論」的大不諱刪除留言，這意味其中資料量的充足，更可能包含不同種類的溝通行動，包括「謗王」。

其四，賴清德在 2017 年 9 月 8 日接任閣揆，自當時到該年底，正與「講幹話」一詞的流行高潮時間重疊。

其五，從後見之明來看，賴揆的政治演說，特別喜歡用「功德」一詞。2017 年 6 月，他接任閣揆之前在美國的演說，即以「功德台灣」說明台灣受到國際社會敬重的原因 ( 台南市政府新聞及國際關係處，2017 年 6 月 23 日 )；而在接任閣揆後的 10 月 13 日，又表示消防員從事非其專業的捕蜂捉蛇工作，可以「做功德」( 程平、劉宛琳，2017 年 10 月 24 日 )，當時這句話已經激起不滿，被指責是在「講幹話」。到了 11 月 24 日，賴揆再度發表「照服員功德說」，表示照服員薪水雖然只有三萬元，與工作實質內容相比好像不划算，但是他勉勵照服員，要做

---

<sup>12</sup> 許多不知「講幹話」原意的人，望文生義地把它誤解為「罵髒話」。例如 2017 年 12 月 17 日的一篇報導，就錯誤地把「幹話」誤解為「髒話」：「『幹你 X』、『臭 X 子』，有些人一生氣，就會口不擇言，亂罵三字經，大罵幹話」( 櫻桃君，2017 年 12 月 17 日 )。

功德給台灣 ( 陳雨鑫 · 2017 年 11 月 24 日 ) · 此話一出更是群起情激憤。12 月 1 日 · 抗議人士將路標與大眾運輸站牌的「行政院」標示 · 以「功德院」貼紙覆蓋 ( 呂思逸、林良齊、翁浩然 · 2017 年 12 月 2 日 )。12 月 23 日 · 在反對賴揆主導修改勞基法的「我血汗過勞、你功德個屁」遊行中 · 宣傳車上掛了「不要幹話 · 你功德個屁」的大字報 ( 見圖一 )。到了 12 月底 · 賴揆同樣因為「功德說」 · 被參與「2017 天下第一幹話王」票選活動的臉書用戶評為第一。( 蘋果即時新聞 · 2018 年 1 月 1 日 ); 相較之下 · 蔡總統只被評為第六名 ( 同上引 ) · 而在同一段時間 · 蔡總統發表的言論 · 並未引發大規模的義憤。

由於上述原因 · 本研究挑選以 2017 年 11 月 24 日「照服員功德說」發表當天的前後一星期 · 即 18 至 30 日的《賴清德》與《蔡英文 Tsai Ing-wen》粉絲專頁 · 進行文字探勘與論述分析 · 據以了解臉書用戶的謗王行動 · 以及這些行動在此政治溝通脈絡中的意義。



圖一：2017 年 12 月 23 日「我血汗過勞、你功德個屁」遊行宣傳車上 · 掛了「不要幹話 · 你功德個屁」的大字報。

出處：網路

本研究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 · 採取 2017 年 11 月 18 日至 30 日之間 · 《賴清德》與《蔡英文 Tsai Ing-wen》粉絲專頁 ( 以下簡稱粉專 ) 的貼文、臉書用戶 ( 以下簡稱臉友 ) 針對這些貼文的留言 ( 擷取到第二層 ) · 以及這些留言獲讚數的資料 · 如下表所示。

表一：本研究採取《賴清德》與《蔡英文 Tsai Ing-wen》粉專資料的後設資料 ( meta data )

資料來源：本研究與莊維孝 ( 2017 年 12 月 8 日 )

臉書粉絲專頁名稱	賴清德	蔡英文 Tsai Ing-wen
不重複互動人數 ( 截至 2017.10 )	55,773	91,795
貼文時間範圍	2017.11.18-30	同左
採取資料日	2018.2.28	同左
貼文數	16	8
總留言數 ( 截至 2018.2.27 )	4,613	14,882
18-23 日貼文留言數	988	7,509
24 日貼文留言數	1,226	N/A ( 當日無貼文 )
25-30 日貼文留言數	2,399	73,73
留言獲讚總數 ( 截至 2018.2.27 )	7,304	28,185

根據臉書機制，臉友可在事後對先前貼文留言，因此某時段貼文的留言，還包括之後時段所留言者。這是不同於面對面的臉書中介溝通特徵，必須注意。

#### 七、經驗資料分析之一：量化描述與資料詮釋

為了解臉友對「照服員功德說」( 以下簡稱「照功說」) 的反應，首先可以將這批資料按日期切成三段來看，包括「照功說」之前的 18-23 日，當日的 24 日，以及之後的 25-30 日。

在閣揆粉專那裏，這三時段的留言數分別是 988、1,226 與 2,399，「照功說」發表當日留言數，超過前六日總和，後六日留言數，又是前六日的 2 倍以上；而在總統粉專那裡，三時段留言數則分別是 7,509、N/A ( 當日無貼文 ) 與 7,373，「照功說」發表前後的留言數差不多。這可以詮釋為，臉友對「照功說」的反應強烈，而且這些反應指向賴揆而非蔡總統。

網友的這些強烈反應，是在什麼樣的政治溝通脈絡中被引發出來的？

若將某時段中，包含某關鍵詞的留言數，分別除以該時段總留言數，可以得到一個百分比數，亦即在某時段中，包含某關鍵詞的貼文數，佔該時段總貼文數的百分比。

以這種方式處理資料中包含「勞工」的留言數，則在閣揆粉專那裏，三時段的百分比數字分別是 13.87%、9.55%與 16.67%；而在總統粉專那裏，則是 6.11%、N/A（當日無貼文）與 6.32%。另外，包含「功德」的留言數百分比，在閣揆粉專那裏，三時段的數字是 2.02%、39.80%與 10.84%；在總統粉專那裏，是 0.31%、N/A（當日無貼文）與 0.53%。

這些數字指出，無論「照功說」前後，也無論在賴揆或蔡總統粉專那裡，「勞工議題」都是臉友留言重點。而之所以在閣揆粉專那裏有更大的百分比，可由「勞基法修法，是在賴揆 9 月 8 日上任後所推行，因此人民也都認為，賴揆該為此負責」的政治溝通脈絡加以詮釋。而賴揆的「照功說」一出，在閣揆粉專留下包含關鍵詞「功德」的留言百分比，竟從前六日的 2%暴增近 20 倍，佔 24 日留言的四成，到了後六日也還有一成；相較於在總統粉專那裡始終都低於 1%，顯然臉友的激烈反應，確實是在針對賴揆與他的「照功說」。

又，這批資料中，臉友的強烈反應，是正面或負面的？

若以包含「加油」的留言數百分比，作為正面反應的指標，則在閣揆粉專那裏，三時段的數字分別是 7.89%、3.84%與 4.42%；在總統粉專那裏則是 5.85%、N/A（當日無貼文）與 4.19%。

這些數字指出，臉友對賴揆的正面反應指標，在「照功說」當日腰斬，而之後六日也未恢復到之前的水準；對蔡總統的正面反應指標，也在「照功說」之後下跌，但這是單純的波動，抑或受到「照功說」影響則未知。

根據過去經驗研究，人們說出口的髒話中，三分之二是在表達憤怒（Jay, 1999），而以「工人智慧」檢視本研究採集的這批資料，則包含「他媽的」、「你媽的」、「你娘」或「幹！」（包含驚嘆號）——通稱為「國罵」——關鍵詞的全部 48 則留言（閣揆粉專 26 則，總統粉專 22 則）中，甚至只有 1 則不是在表達憤怒，可見髒話確實有效代表了憤怒。因此，再以包含「國罵」的留言數百分比，作為負面反應的指標，則在閣揆粉專那裏，三時段的數字是 0.30%、0.53%與 0.71%；而在總統粉專那裏，則是 0.17%、N/A（當日未有貼文）與 0.12%。

這些數字指出，臉友對賴揆的負面指標，在「照功說」當日，增加到前六日的 1.7 倍，在後六日又再繼續上升，是前六日的 2 倍以上；而對蔡總統的負面指標，反倒在「照功說」之後下跌。同樣，但這是單純的波動，抑或受到「照功說」影響，並未可知。

綜合言之，這些數字（如下表二所示）可以詮釋為，臉友對「照功說」的強烈負面反應。同樣的，這些反應指向賴揆而非蔡總統。

表二：賴清德與蔡英文粉絲團，在 2017 年 11 月 18-23 日、  
24 日與 25-30 日三時段，包含關鍵詞的留言數百分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

臉書粉絲專頁名稱	賴清德			蔡英文 Tsai Ing-wen		
	18-23 日	24 日	25-30 日	18-23 日	24 日	25-30 日
留言數	988	1,226	23,99	7,509	N/A	7373
包含「勞工」留言數百分比	13.87%	9.55%	16.67%	6.11%	N/A	6.32%
包含「功德」留言數百分比	2.02%	39.80%	10.84%	0.31%	N/A	0.53%
包含「加油」留言數百分比	7.89%	3.84%	4.42%	5.85%	N/A	4.19%
包含「國罵」留言數百分比	0.30%	0.53%	0.71%	0.17%	N/A	0.12%
包含「幹話」留言數百分比	1.88%	6.88%	6.25%	0%	N/A	0%

## 八、經驗資料分析之二：論述分析「具溝通理性的謗王行動」

在量化描述這批資料，並加以詮釋之後，接下來進入分析重點：這些臉友的強烈負面反應，是在「謗王」嗎？

前段已經說明過，本研究以關鍵詞「幹話」，作為橫跨心理與社會-文化溝通脈絡等級，2017 下半年的在地謗王指標。包含關鍵詞「幹話」的留言百分比，在閣揆粉專那裏，三時段的數字分別是 1.88%、6.88%與 6.25%；在總統粉專那裏則是 0%、N/A（當日無貼文）與 0%，如上表二所示。

「幹話」留言數百分比，在「照功說」當日增加 2.7 倍，比「國罵」增加的 1.7 倍還高，雖然在後六日略微回跌，但還是比前六日的百分比高出 2.3 倍。在這批資料中，「幹話」確實與「國罵」一樣，可以作為憤怒的指標，這可從以下兩則留言——分別包含關鍵詞「國罵」與「幹話」——之間，都很清楚是在表達憤怒而可以看出「功德做好做滿，勞工壓好壓滿，幹！」、「幹話王，我們台南人不應該把你這妖孽放出來危害人間」。

既然「國罵」作為指標，似乎就可以指出這批資料中的謗王行動，那麼還需要「幹話」作為指標嗎？

需要。首先，「國罵」指出的只是憤怒，而憤怒不等於義憤。在這批資料全部 48 則包含「國罵」的留言中，獲得最多讚數的一則，其讚數也就只有 36，可見得這些留言未能引發臉友進一步討論。

其次，與其說「國罵」指出這批資料中的謗王行動，不如說指出惡言相向，只不過這批資料的特定脈絡——統治者的粉專，限制其中的惡言相向，大部分是指向統治者，才會有「國罵指出謗王行動」的錯覺。事實上，這批資料中的國罵，有少數是「臉友間的互罵」，尤其在第二層留言中，例如以下這段留言，其實是為賴揆辯護「賴清德接任行政院長也才二個月？你當國家政策用喊的還是煮速食麵啊？幹！一堆北七酸民」。

其三，「國罵」固然能夠指出惡言相向，但惡言相向未必具有溝通理性，而「具有溝通理性的惡言相向」才是本研究所關切的。這批資料中，包含「國罵」的留言，都只在表達憤怒，如前段所示範過的。與之相比，包含「幹話」的留言，在論述形式上則更為多樣。除了單純表達憤怒外，還有理據分明地表達意見者。例如一位照服員賴先生，回應賴揆 24 日貼文的留言——這篇留言獲得 185 讚，也是這段期間的閣揆粉專留言中，獲得次多讚數者，可見其所引發的「義」憤：

身為一個照服員我想說：照服員每天為老人把屎把尿、翻身拍背、抱人上下床等等的，多少從業人員有大半時間都花在案主的身上，因為長期抱人抱重物關係最後因為椎間盤突出的退休無法再繼續做的也一大堆人，我們工作一天 8 小時的辛勞月薪，即使身在公家機構裏面也還實領不到三萬。其他在居服、醫院的照服員們看似一日薪資 2200 很高，但長時間綁在案主身旁，換算下來的時薪比法定基本時薪還不如，沒福利沒保障，其中還要被中間人抽成，這樣子還要被你說就當作做功德就好。照服員身為第一線的長照人力團隊來說已經很不被重視了，口口聲聲打著長照 2.0 的包裹式服務，有多少本勞人力再進行著？有多少機構人力不足，還一直畫著大餅要畫多久？想要年輕新血投入長照領域行業裏面，卻又說三萬元的低薪當作做功德就好，那你有本事就說所有公職人員不論年資全部都是月領三萬薪水，都做功德就好。不要在那邊領著肥水說著幹話，那不如想辦法提升照服員的薪資比較實在。

這則留言並發展成討論串，好幾位照服員或照服員親屬，也參與了討論，例如下二則：

謝謝您說出第一線人員的心酸，我馬上截圖給媽媽看，她的同事們好多都做到職業傷害……連三萬都不到，這不是做功德，是做心酸！

我是長照 2.0 居家服務員新人，一個月總結下來扣掉勞健保實領剩 16000.....我的學姐入居服兩年，她離職前說她一個月領不到 15000.....

也有同是「功德說」受害者的消防員家屬出聲：

我是消防員家屬，沒受過相關訓練的兄弟被派去抓蜜蜂抓蛇，而且要是出了意外還不算殉職.....這在院長口中也是功德.....我看您乾脆改名叫賴功德好了，缺什麼叫什麼吧！

然而在這串留言中，也有反倒是對賴先生惡言相向者，如下：

馬英九政府的時候你抱怨了嗎，說什麼幹話

你怎麼不去考公務員？考不上！

這兩篇留言或許是支持賴揆的臉友所留。可以這麼說：在賴清德「粉絲」專頁中，完全缺乏與「謗王行動」相對的「護駕行動」反而奇怪。而這類「護駕現象」與「謗王現象」之間的關係，值得進一步加以探究。

綜合言之，雖然「講幹話」在這段期間的創新語用脈絡與流行，是歷史的偶然，但至少在本研究所採取的資料中，它確實比「國罵」更可能指出「具有溝通理性的謗王行動」。而即使本文所採取這麼小的資料範圍內，也確實存在人民追求與統治者達成新共識，「具有溝通理性的謗王行動」。如同本文第六段「資料選取」所說明過的，「政治人物的粉絲專頁，已經框架了其所中介的主要溝通行動，是政治溝通行動，而只有在政治溝通脈絡中的謗王，才可能具有溝通理性」，因此本研究所選取的資料範圍會出現這種情況，並不令人意外。

## 九、結論

無論古典文獻或現代理論都指出，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人民出於義憤而對統治者惡言相向，未必就是缺乏溝通理性。為瞭解台灣「謗王」的實際情況，本研究透過文本探勘與論述分析，檢視行政院長賴清德發表「照護員功德說」的前後一星期，即 2017 年 11 月 18 日至 30 日之間，賴清德院長與蔡英文總統的臉書粉絲專頁資料。

首先，文本探勘結果顯示，在賴揆「照護員功德說」發表以後，其粉絲專頁留言中的正面留言數百分比下降、負面留言數百分比暴增，另一方面在蔡總統粉絲專頁那裡，則未呈現同樣的情況。這些數據變化，可由「臉友認為，比起蔡總統，賴揆更該為勞基法修法負責」的政治溝通脈絡加以詮釋。

其次，論述分析結果顯示，即使本研究所採取這麼小的資料範圍內，也確實出現不只表達憤怒，而且意圖與統治者達成新共識的，「具有溝通理性的謗王行動」，雖說本研究在事前就已經挑選了，最有可能出現此現象的的資料範圍。

此外，本研究發現「護駕行動」可能伴隨「謗王行動」一起出現。而這類「護駕現象」與「謗王現象」之間的關係，或許值得進一步加以探究。

由於截稿日限制，本研究只在極小的資料範圍內，對在地謗王現象進行初探。未來若能基於更鉅量的資料做進一步的研究，或許可以得到更有價值的新發現。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分

- 自由時報 ( 2017年5月23日 ) a。〈蔡啟芳嗆「斷絕父子關係」 蔡易餘：我爸是講幹話之王〉·《自由時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076173>
- 自由時報 ( 2017年5月23日 ) b。〈「我爸是講幹話之王」 蔡易餘怨遭媒體扭曲.....〉·《自由時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076450>
- 台南市政府新聞及國際關係處 ( 2017年6月23日 )。〈台南市賴清德市長受邀赴洛杉磯演講—台灣的挑戰與出路〉。取自：  
<http://web.tainan.gov.tw/info/page.asp?id={63D4F7B9-30D1-4052-812E-F7AAB234A38F}>
- 陳敦源、蕭乃沂、廖洲棚、陳心怡、國家發展委員會、電子治理研究中心 ( 2017 )。《Web 2.0時代的民意探勘：政府部門網路輿情分析的概念與實務》。台北：國家發展委員會。
- 呂思逸、林良齊、翁浩然 ( 2017年12月2日 )。〈行政院被貼成「功德院」青年團體發起 將「行政院」路標、站牌更名 賴揆：有創意 政院不追究〉·《聯合報》。
- 陳希林 ( 1997年5月3日 )。〈「為台灣而走」 上萬人報名 70個社團 呼籲民眾明天站出〉·《聯合報》。
- 陳雨鑫 ( 2017年12月24日 )。〈照服員3萬薪水好像不划算...” 賴揆：當做功德挨批〉·《聯合晚報》。
- 陳蕾 ( 2014年11月 )。〈科技賦權下的社會運動：以社群網站中的「洪仲丘事件」公民參與為例〉·「2014創新研究國際研討會」·台北。
- 程平、劉宛琳 ( 2017年10月24日 )。〈不滿捕蜂捉蛇 消防員政院抗議...賴揆：國軍救災也沒推辭〉·《聯合晚報》。
- 趙維孝 ( 2017年12月8日 )。〈粉專大健檢，全台粉絲專頁經營概況全面觀測 ( 1 ) - 不重複互動人數〉·取自：<https://goo.gl/CXUMH8>
- 蘋果即時新聞 ( 2018年1月1日 )。〈票選出爐「2017天下第一幹話王」是他！最後1名也好意外...〉·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101/1270262/>
- 櫻桃君 ( 2017年12月17日 )。〈斯文男一上床 狂爆粗口〉·《聯合報》。

## 西文部分

- Alderman, N., Knight, C., & Morgan, C. (1997). Use of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Overt Aggression Scale in the measurement and assessment of aggressive behaviours following brain injury. *Brain Injury, 11*, 503-523.
- Aloia, L. S., & Solomon, D. H. (2016). Emotions Associated with Verbal Aggression Expression and Suppression.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0*, 3-20.
- Block, J. H., Block, J., & Morrison, A. (1981). Parental agreement-disagreement on child-rearing orientations and gender-related personality correlates in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52*, 965-974.
- Bolton, R. (1986). Barriers to communication. In J. R. Stewart (Ed.), *Bridges not walls: A book abou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4 ed., pp. 134-145).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Casstells, M. (2012).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Charles, H., & Mech, E. (1955). Performance in an operational "stress" situation related to a projective techniqu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8*(509-519).
- Code, C. (1987). *Language, aphasia, and the right hemisphere*. New York, NY: Wiley.
- Cummings, E. M., Davies, P. T., & Simpson, K. S. (1994). Marital conflict, gender, and children's appraisals and coping efficacy as mediators of child adjust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8*(2), 141-149.
- Day, R. C., & Hamblin, R. L. (1964). Some effects of close and punitive styles of supervi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499-510).
- Ekman, P. (2003). *Emotions revealed: Recognizing faces and feelings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NY: Times Books/Henry Holt and Co.
- Gainotti, G. (1972). Emotional behavior and hemispheric side of the lesion. *Cortex, 8*, 41-55.
- Gazzaniga, M., Ivry, R., & Mangun, G. R. (2008).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he Biology of the Mind*. New York, NY: W.W. Norton and Company.
- Guillory, J., Spiegel, J., Drislane, M., Weiss, B., Donner, W., & Hancock, J. T. (2011). *Upset now?: Emotion contagion in distributed group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CHI 2011), Vancouver, BC, Canada.
- Habermas, J. (1981).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 McCarthy, Trans. Vol. 1).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Hamilton, M. A. (2012). Verbal aggression: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31*(1), 5-12.
- Hancock, J. T., Gee, K., Ciaccio, K., & Lin, M-H. (2008). *I'm sad you're sad: emotional contagion in CM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SCW '08: Proceedings of the ACM 2008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an Diego, CA.

- Hatfield, E., Cacioppo, J., & Rapson, R. L. (1994). *Emotional contag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 Haward, L. R. C. (1958). The effect of chlorpromazine on verbal aggression. *Indi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2(367-373).
- Hyder, S., Coomber, K., Pennay, A., Droste, N., Curtis, A., Mayshak, R., Lam, T., Gilmore, W., Chikritzhs, T. & Miller, P. G. (2017). Correlates of verbal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among patrons of licensed venues in Australia. *Drug and Alcohol Review*, 37(1), 6-13.
- Infante, D. A., & Gordon, W. I. (1985). Superiors' argumentativeness and verbal aggressiveness as predictors of subordinates' satisfac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 157-192.
- Infante, D. A. (1987). Aggressivene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J. C. M. J. A. Daly (Ed.),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Infante, D. A., & Rancer, A. S. (1996). Argumentativeness and verbal aggressiveness: A review of recent theory and research.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 319–351.
- Jackson, H. (1958). *Selected writings of Hughlings Jackson*, (Vol. 2).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James, A. I. W., Boöhnke, J. R., Young, A. W. & Lewis, G. J. (2015). Modelling verbal aggression, physical aggression and inappropriate sexual behaviour after acquired brain injury.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2(1811).
- Jay, T. (1999). *Why we curse : a neuro-psycho-social theory of speech*. Amsterdam, NL: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Kinney, T. A. (1994). An inductively derived typology of verbal aggression and its association to distres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 183–222.
- Lai, J. Y., & Linden, W. (1992). Gender, anger expression style, and opportunity for anger release determine cardiovascular reaction to and recovery from anger provocation.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3, 297–310.
- Ley, R. G., & Bryden, M.P. (1979). Hemispheric differences in processing emotions and faces. *Brain and Language*, 7, 127-138.
- McLuhan, M. (199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ontagu, A. (1967). *The anatomy of swearing*. New York, NY: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 Pinker, S. (1994). *The language instinct: How the mind creates language*. New York, NY: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 Porter, B., & O'Leary, D. (1981). Marital discord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8, 287–295.
- Rao, V., Rosenberg, P., Bertrand, M., Salehinia, S., Spiro, J., Vaishnavi, S., Rastogi, P., Noll, K., Schretlen, D. J., Brandt, J., Cornwell, E., Makley, M., & Miles, Q. S. (2009). Aggression after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revalence & Correlates. *Journal of Neuro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21(4), 420-429.
- Sebastian, R. J., Parke, R. D., Berkowitz, L., & West, S. G. (1978). Film violence and

- verbal aggression: A naturalistic stud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164-171).
- Shapiro, A. K., Shapiro, E.S., Young, J.G., & Feinberg, T.E. (1988). *Gilles de la Tourette Syndrome* (Vol. 2). New York, NY: Raven Press.
- Stephens, R., Atkins, J., & Kingston, A. (2009). Swearing as a response to pain. *Neuroreport*, 20(12), 1056-1060.
- Van Lancker, D. (1987). Nonpropositional speech: Neurolinguistic studies. In A. W. Ellis (Ed.), *Progress in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 3, pp. 49-118). London. UK: Erlbaum.
- Whitehead, L. (1979). Sex differences in children's responses to family stress: A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20, 247-254.
- Winner, E., & Gardner, H. (1977). The comprehension of metaphor in brain damaged patients. *Brain*, 100(717-729).
- Yudofsky, S. C., Silver, J. M., Jackson, W., Endicott, J., & Williams, D. . (1986). The overt Aggression Scale for the objective rating of verbal and physical aggress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43, 35-39.

Stop jiang gan hua! Tentatively probe into the phenomenon of "slandering the king" in Taiwan's social media

#### Abstract

Both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 theory point out that in the case of unequal power, people who are angered by the injustice will verbal aggression on rulers. This is not a lack of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slandering the king" in Taiwa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fan page data of Lai Ching Tak and Tsai Ing-wen through the method of text mining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e time for generating this data is between November 18 and November 30, 2017.

Keywords: verbal aggression, profanity, anger at injustic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ext mining, jiang gan hua (bullshit)